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增刊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06
(SOCIAL SCIENCE EDITION)

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
——以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为例

陈英楠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自身也存在"困境",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际上是从影响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改变其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结果。本文通过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案例介绍,分析在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过程中,该村村民的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初步检验了意识形态可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走出困境。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的问题。

关键词:集体行动;意识形态;公共环境卫生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S0-0160-07

农村道路、卫生、休闲等公共设施的欠缺,以致村民共享的村容、生活环境等集体公共利益的受损,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表现之一。此外,村民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常常不会促进村集体的公共利益,如有些地方,村民自家内的环境卫生往往处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但屋外的公共环境卫生却是十分糟糕。因此,除了政府的公共财政对于城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供给这个主要因素之外,农村社区内部村民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也是要实现"村容整洁"①目标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农村社区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以后的维护,体现出一种"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称"集体行动的困境"却往往存在;但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个别地方似乎正在突破这种困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综述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及有关学者提出的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作用;第二部分是关于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案例介绍;第三部分分析在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过程中,村民的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一个小结及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集体行动与意识形态关系综述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从个人是理性人和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出发,如果某一集团中的成员有共同利益,那么自然而然地,个人会为了实现自我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实现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M. Olson)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则认为在需要集体行

收稿日期:2006-09-25

作者简介:陈英楠(1981-),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

指导老师:程昆.

①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则较为详细地对这项历史任务的要求进行了规划。其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包括了"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两方面。如果这两方面的建设进展顺利,对于"二十字"总目标中的"村容整洁"的实现将起到莫大的推动作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动的领域中，“个人理性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他的研究表明理性经济人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这与传统理论的结论相反（陈万灵，2002）。奥尔森得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大集团与小集团划分的基础上。奥尔森认为，小集团可能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这是因为集体物品对于个体成员，或至少其中的一个成员来说，提供的成本小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倾向提供集体物品，因而并不明显违背传统理论；但是，他还认为，虽然小集团可能有集体利益，但小集团内部是不平等的，在小集团中不仅提供的集体物品数量不会达到最优数量，而且还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令人惊讶的倾向”（奥尔森，1995）。而大集团中的利益互动则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集体利益，因而与传统理论完全相违。奥尔森认为，不管小集团还是大集团的成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理性地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在大集团中，集团成员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结果却不会促进公共利益。他从集团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公共利益本身的性质以及大集团的组织成本这三个方面对此作出了详尽的分析（罗必良，1999）。

因此，奥尔森所揭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实际上说明集体行动的矛盾。罗必良（1999）把这种矛盾命名为“奥尔森困境”（Olson's dilemma），并强调了“奥尔森困境”本身也有其困境。历史经验及现实情况都表明，当集体中个体的收益不明显高于成本时，大的集体仍然在行动（诺斯，1994a）。陈万灵（2002）认为其原因在于奥尔森忽略了集团内部成员在长期博弈过程形成的组织制度即规则约束、隐性激励机制和大集团本身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而隐性激励（implicit incentive mechanism）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二是外部的市场竞争。刘玉照（2004）认为奥尔森的逻辑揭示了规模因素对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但现实中许多规模差别不大的集团，行动能力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或者规模差别很大的集团却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影响一个集团集体行动的其他因素和变量。

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关键是要约束集团成员的搭便车动机。对此，奥尔森认为，对于大集团来讲，只有一种独立和“选择性”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奥尔森，1995）。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是对那些承担了集体行动成本的人进行奖励，也可以是惩罚那些没有为集体作出贡献的人，即是说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激励。在现实中，这种“奖惩制度”是有效组织的必要保证。另一方面，被奥尔森所忽视的道德等隐性激励，实际上对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功的意识形态[①]可以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诺斯，1994a）。林毅夫（1994）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施检查搭便车。同时，他解释了这里的选择性激励区别于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的地方，即扩大了效用函数的范围——加入了消费虔诚商品（Piety commodity）对于个人效用的提高。也就是说，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针对的是新古典经济人搭便车动机这一关键因素，但未考虑意识形态在大集团“被动员起来”的过程中可能会起的作用（汪立鑫，2005）。

综上所述，诺斯等是将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人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没有考虑意识形态这个变量。诺斯（1994a）认为应该扩展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以解释意识形态的功能，如尊严。林毅夫（1994）认为虔诚应该是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变量之一。实际上，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个人之所以拥有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给个人带来了效用的增

① 关于意识形态，诺斯（1994b）将其定义为“所有人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观念（即模型和理论）”；林毅夫（1994）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对于意识形态含义的讨论，可参见罗必良. 新制度经济学.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717－720。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加。因此,一个合理的拓展是,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作用,根据成本-收益分析,除了克服搭便车问题之外,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可以起到缓解利益冲突、降低组织成本等作用。

二、大路前村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①

大路前村是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的一条自然村,是花卉专业村和革命老区村庄,户籍人口960人,186户,耕地601亩。村中共有六大姓,其中梁姓村民占村人数超过90%。2000年以前,该村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集体年收入仅有1.5万元,人均收入2550元。目前,该村在镇花卉示范区的辐射下,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把400亩土地连片出租给花卉企业。200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53万元(农民年人均分红300元)。此外,村中家家户户在花卉企业学到种花技术后,都在自留地种植花卉(0.3亩/人),人均年增收3500多元。大路前村在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之前,村庄"脏、乱、差"现象非常突出,特别是圈地占地、乱搭乱建、破烂祖屋、牛栏猪舍、"香火屋"②到处可见。该村过去是远近有名的"空心村",农民生活宽裕后,村民都到村外建新房。旧村场的村道村巷连牛车都通不过,变成了污水横流、祖屋破烂、杂草丛生的"空心村",尤其是在旧村场还建有30多座"香火屋",严重影响村民生活质量,浪费了大量土地。

2005年4月始,该村在创建文明卫生村③的过程中,村内公共环境卫生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最初,由于该村的旧村场排污不畅导致地表渗水,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村民小组(7人)协商一致,提出要改水、改厕、修建排污设施,在得到村内老一辈的人物支持后,召开村民群众大会④,绝大部分村民表示同意。此后,上级政府引导该村要创建文明卫生村。随后,在衡量了创建文明卫生村对于村的长远发展以及自身生活质量改善的好处之后,村干部与绝大多数村民取得了意见的统一。虽然有少数村民表示这些目标实现不了,或者表示即使生活环境差一些也习惯了,但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没有产生太大的阻碍。

建设至今,累计投资280多万,其中集体出资1百多万,村民集资数十万,施工队带资修建几十万,故村仍欠债几十万,但估计今明两年可以还清。该村聘请规划部门设计勘测,按照新农村的发展要求,编制了村建设规划。建成硬底化主干道3.4公里,硬底化巷道27条,村中道路硬底化率为90%;建成硬底化排污沟54条,总长为4.3公里;建设村文化楼;完成所有村道名牌的设置;修建活动室、文化室、棋艺室各1间;建成1个标准篮球场;打深水井一口,建水塔一座,同时铺设管道到各家各户,使村民饮上符合水质标准的自来水;建成符合卫生标准的户厕177间、改厕率为95%。拆除残旧闲置房屋35间,香火屋32间,清理坟墓一批,回收盘活集体土地35亩。在闲置地上建设了3个休闲小公园;在村道两旁、村民庭院内外新种花卉、苗木5000多株。

在建设过程中,村民表现了很高的热情和觉悟,团结合作,捐草皮、树木一批,折合85万元。为了节省经费,建设基本由村民自己动手,村民每天出工计价20元/天,任指挥的三名村民计价30元/天。村干部带头拆除自己的挡道建筑物,而且做自己亲属的工作,村民在此带动下自觉性也较高。而且,村干部对村民表示,由于村集体经济近几年才有起色,经济实力不雄厚,为了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和节省费用,任何人被拆除的建筑物和损失,一律不赔偿,村民都表示谅解和同意。80多

① 本文案例的内容来自笔者在当地调研的谈话记录与获取的相关政府材料整理而成。

② "香火屋"为当地各家后人拜祭自家先人,放置灵位的小屋。

③ 广东省及湛江市的创建卫生村都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如"村容村貌整洁,硬底化率达90%以上"是省的标准之一。

④ 每户派代表,但有意愿的村民可以参与,口头表决。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岁的老党员梁世明，不顾年老，为村庄建设积极奔走，在拆除阻路建筑物工作中对村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退伍军人梁志文，凭借多年自己从事花卉种植的经验，指导村庄的绿化建设。副村长梁金山家里是从事运输业的，拥有一辆运输车，因要顾及村中的建设事业，无暇顾及业务，家庭经济遭受较大的损失。村会计梁桂怕错过这次为村庄建设出力的机会，放弃了外出做生意的机会，也专心投入在村的工作上。

在抓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该村还实施了保洁工程，制定了《卫生公约》和《门前"三包"责任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村规民约》，制定了《村民文明公约》，大力树立爱村爱家新风尚。村内的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建设的成果都是村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所以他们非常懂得爱护和珍惜。

三、大路前村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

上述村内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前后情况的对比，反映了起先由于村内的公共环境卫生的公共性，而无法排他，村民出于自利和搭便车的动机（如乱搭乱建和杂草丛生），产生的不合作行为导致了"脏、乱、差"情况的存在。村民之前的个人选择到目前基于集体利益的选择，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村民的支持程度及建设之后如何保持？本文认为，这与村内长期形成的村民意识形态有紧密的联系。

本文将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决策阶段－建设阶段－建成阶段；并分别分析各个阶段中，理论上集体行动可能面临的困境，现实中村民的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克服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数学表达式[①]是：

单个村民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效用函数。本文假设其简化为一位利他主义者，其效用函数包含了他人的效用函数：

$$U^p = U^p\{X_{p1},\cdots,X_{pm},g(X_{s1},\cdots,X_{sm})\}$$

其中，X_p 与 X_s 分别表示 P 与 S 在建设过程中的消费，如劳力、资金等。假设对于单个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村民来讲，这些消耗给村民带来了正的效用。

将大路前村在这个过程中的福利定义为帕累托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即

$$W = f(U_1,U_2,\cdots,U_p)$$

$\partial f/\partial_{Up} > 0$ 且，对任意 P 成立。

由于 f 是单值函数，所以如果某些村民的生活环境改善而且没有村民的生活环境变差，则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建设使全体村民的福利得到提高。

（一）决策阶段

大路前村因村内地表渗水，影响了村民生活，集体选择要进行改水、改厕和修建排污设施；进而上级政府建议其创建文明卫生村，集体进一步选择要进行公共环境卫生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前后两次集体选择，都有明确的共同利益和预期——村内生活环境的改善，村内成员依照村规民约，通过多数投票制（口头投票）相互协商确定了社区集体行动方案。这一阶段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可能体现在集体选择的组织成本对集体行动的制约（这也是奥尔森认为大集团不能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②]）。具体来讲，对于单个村民，进行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是否会给其带来收益及收益的大小，从而影响集体协商过程中的谈判成本。实际情况是村干部与村民达成共识的组织成本并不高，没有产生太多的争议。

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降低了达成共识的讨价还价费用。大路前村在当地

① 本部份的表达式参考了贝克尔（1995）与罗必良（2005）。

② 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0.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村民出于建设自己家园,改善村内生活环境,提高集体福利的动因,集体主义观念降低了对个人利益的预期和谈判费用。据一位经常下村指导卫生建设的区干部介绍,村民对于他的工作表示感谢都是用"为我们村的工作",而不是"我村"。

(二)建设阶段

在建设过程中,集体行动的阻力可能来自于村民的利益冲突和搭便车动机。具体来说,有些村民要拆除自家的房屋、香火屋、清理坟墓等会导致其利益受损,这一类村民的成本是较为明显和现实的,但收益在行动之前不确定;另一类是有搭便车动机的村民,因为每个村民都可以评估自己的成本-收益,如果参加建设的成本大于收益(如舍弃外出经商的机会)或者认为单个人的努力无益于增进整个建设效果,甚至是预期其他村民会在这次建设中投入劳力、资金而自己无需主动采取行动就可以坐享之后环境变化带来的收益,出于这些可能的考虑,村民搭便车的行为就会阻碍建设进展。

相对应的,在建设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使村民决策过程简单化,缓和了利益冲突的矛盾。首先,村干部带头出工和拆除的示范作用,对于村民来讲是一个学习效应。其次,对于一开始不愿意拆除的村民,劝说是主要的手段。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林毅夫,1994)。集体可以对其成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现实中党员对群众进行的思想工作),使其判断体系倾向于集体行动的价值理念。再次,在村中由于人与人见面的机会多,相互评价对于村民的声誉是一个重要影响,实际地讲就是"面子"。村中一位老干部无论村干部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就是不愿拆除自家的旧屋,他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回来说"别家都拆了,建设得漂漂亮亮,自己家再不拆怎么好意思,不拆我就不回去了",后得以拆除。最后,村民能够从本村的集体经济的实际出发,所有个人的损失都没有索要赔偿,大大节约了可能因赔偿谈判而产生的交易成本。据笔者了解,外地一条村的干部得知大路前村的这种情况后,表示"大路前村建设需要二百多万,在我们那里这种建设规模加上赔偿可能需要八百多万"。如果再加上谈判导致的建设周期拉长的成本,那就更难以估计了(可对比的是城市中合法拆迁出现的困难)。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除非该村内还有其它不被外人所知的非正式制度对村民的索赔行为进行制约,否则很难否定村民的意识形态在其中的节约功能。

2. 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村风提高了村民对一些道德标准的效用评价,对于影响村民在这次建设过程中的行为,可能起到了减少分配性努力行为而增加生产性努力行为的作用。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感觉该村村风纯朴,笔者一行数人初次到该村时,村长在一办公室招呼我们,当时村长正和十名左右的村民在旁边的会议室开会,村民将会议室的数张椅子搬过来办公室给我们坐。过后笔者发现,由于会议室的椅子不够了,村民们只能走到旁边的文化楼(一个演大戏的舞台),除了一两位村民是坐着从会议室搬过去的椅子外,其他人都是坐在地上,据此可见一般。据了解,大路前村群众和睦相处,村民尊老爱幼,男女老幼遵纪守法,该村内无邪教、无吸毒、无赌博、无纠纷、无械斗、无安全事故、无刑事案件。据村长介绍,晚上村民的摩托车、自行车放在户外也不用担心。村民在建设自己家园的动机下,热情高涨(如上述案例中的个人举例)。拆除村中的"香火屋"是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本来拆除还要先拜祭和计算时辰,但很多村民在没有村干部监督下,自行就组织拆除。

(三)建成阶段

在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成后,如何保持村内的整洁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也是这个阶段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困境。既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文考察的只能是目前呈现的迹象。大路前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村规民约》,制定了《村民文明公约》,并实行保洁制度,制定了《卫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公约》和《门前"三包"责任制》[①]。村给每户发放一个卫生桶，规定每户每月交垃圾处理费3元。村聘用3名村民组成清洁队伍，每天定时到各户收取垃圾。定期组织人员对村道进行打扫（各户安排代表，出工不给报酬，不出工的年终分红扣钱）。垃圾集中拉到指定地点倒放处理。成立村卫生管理小组和检查小组，定期进行检查督促和评比，引导村民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保持村容整洁。

当个人的经验与其意识形态不相符时，人们就会试图发展一套新的，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意识形态，而这需要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积累过程（诺斯，1994a）。可以预见，制度的约束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将影响村民对于社区和自身环保、卫生的思想观念的形成。

四、结束语

本文的分析初步检验了意识形态可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走出困境。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的问题，使该村的公共环境卫生建设能在七八个月＋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②]，而村容村貌的改观，又使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得以提高，从而可能长远地增进整个村的福利。

最后，本文认为分析大路前村村民建设的动因，还有两个值得思考的地方，一是村民的"官本位"意识。历史上，大路前村在解放前原叫大僚前，大意是村民认为村的发展离不开朝中有人。大路前村还是革命老区。近年来，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规划，村民认为"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村民对于上级政府的意见十分重视。因此，村民对于上级要求创建卫生文明村，这种意见与村民的动因之间又是怎样一种联系？二是没有详细分析村民的集体行动与村民对以村长[③]为首的村干部的信任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陈万灵. 社区研究的经济学模型－基于农村社区机制的研究. 经济研究[J]. 2002,(09):57－66.
[2]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加里.S.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 罗必良. "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 学术研究[J]. 1999,(09):08－11.
[5] 罗必良. 新制度经济学[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6] 刘玉照. 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以白洋淀某村修路与基层选举为例. 社会[J]. 2004,(11):17－22.
[7]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a.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b.
[9] 汪立鑫. 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的框架. 世界经济文汇[J]. 2005,(04):36－41.

① 这些举动体现的是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对集体行动的约束。

② 大路前村2005年底被授予广东省卫生村称号。

③ 村长梁景和在村中威信极高，从1990年开始任村长，虽多次想卸任，但都被村民挽留，村民表示村的发展离不开他。此外，他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的兽医，人缘好。在村中，经常可以见到小孩，即使是骑车经过了也要转回头向村长打招呼。他说村工作，一定要向村民多讲道理，多解释，但如果总是说不通，村长也要有脾气。他还说笑地说，村民说他的缺点就是有脾气，但村民又说正是他的脾气才领导村民做了那么多事。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he Study of the Ideology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the public health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Daluqian Village

CHEN Ying-n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logic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esented by Olson has a "dilemma" itself. The ideology can settl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influencing the personal utility func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the public health construction in Daluqian village, the paper analyses how the ideology of villagers 'effects the collective ac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proved that the ideology can lead the collective action out of its dilemma.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ideology; public health

(上接第 159 页)

参考文献:

[1] 丁泽霁.《农业经济学基本理论探索》.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 [美]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3] 白菊红:河南农户家庭收入差异分析[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2).
[4] [美] 雅各布·明塞尔. 人力资本研究[M]. 张风林,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5] 张 洪,苏伟洲. 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益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9).
[6] 徐佩华. 转化农村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的研究[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
[7] 郭 悦. 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培训,2000(2).

Strengthening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Cultivating the New Peasants

YU Hao-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hold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determines one's income level. Therefore, to cultivate the new peasants should start with raising the peasants' quality. Among all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ms,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Consequently,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s the effective path to save the peasants out of the poverty.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new peasants; professional skills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